● 外国文学

《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

李 儒 寿

(襄樊学院, 湖北襄樊 441053)

[作者简介] 李儒寿(1955-), 男, 湖北鄂州人, 湖北襄樊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摘要] 《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性格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 但又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海丝特·白兰的性格特征不是单一抽象的, 而是勇敢性、反抗性中包含着妥协性, 并以妥协性为基础, 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关键词] 《红字》; 海丝特·白兰; 勇敢性; 反抗性; 妥协性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86-04

自 1850 年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问世以来的一百多年, 一代又一代的评论家们为之呕心沥血, 试图探究它那幽微高深、扑朔迷离的思想, 精巧细密、浑然天成的艺术和内涵丰富、匠心独运的人物。就人物形象言, 《红字》中的主要人物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 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应该怎样看待小说中那个因“犯通奸罪”而饱受凌辱的女人呢? 她是勇于反抗的英雄抑或是屈从命运的弱者? 是一位富于反抗精神的典范, 还是一个不彻底的反抗者?

—

作为《红字》的主人公, 从作品中所透露的迹象看, 海丝特·白兰主要是一个勇敢而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

年轻的海丝特, “身材欣长, 体态优美绝伦。她的秀发乌黑浓密, 在阳光下光彩夺目。她的面庞皮肤滋润, 五官端正, 在清秀的眉宇间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 使之极为楚楚动人”。不幸的是, 在她还不懂得选择爱情的时候, 就嫁给了一个畸形、衰老的学者齐灵沃斯, 由此开始悲剧性的人生历程。他们之间有婚姻关系, 却不存在爱情, 更没有情感共鸣。海丝特与齐灵沃斯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不自然的婚姻关系, 对于海丝特的心理是一种伤害, 对于她作为女人的本性是一种侮辱。它无法满足海丝特对真正爱情的渴望, 最终导致她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

在波士顿独居的日子里, 海丝特结识了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她心中最强烈的感情被唤醒, 爱情在他们之间产生了, 然而, 这种爱情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宗教法律下不可能发展成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她选择了勇敢抗争去赢得幸福之路。他们暗中结合了! 这一结合表明了她追求婚姻幸福的勇气, 也体现了她对宗教的反抗, 对政权、夫权和宗教权的挑战。

海丝特和牧师结合的结晶珠儿的孕育和问世, 使海丝特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为了保护心爱的人, 海丝特拒不说出爱人的名字, 决心一人承受所有的责难和惩罚。当威尔逊牧师诱逼她交出“奸夫”的名

字并保证可以去掉她胸上的红字时,海丝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说!”“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无法把它取下来,但愿我能忍受我的痛苦,也能忍受他的痛苦!”她如此勇敢地承受一切罪责的言行,向世人昭示:她和牧师的爱是纯洁无瑕的,她愿意为心爱的人牺牲女人的自尊。

超凡的勇气和强烈的爱情促使她将孩子生下,并决心将其抚养成人。难怪指责海丝特不纯洁、不道德的评论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对她表示叹服,承认她比那些为了隐瞒罪行而抛弃自己骨肉使之因无人照管而死去或由他人抚养的女人,要勇敢得多、崇高得多!

勇敢的精神伴随着她对清教势力的强烈反抗精神。海丝特性格坚毅,从不向人诉苦,也不乞求别人的怜悯与宽恕。她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执著于真挚的爱情。她敢于接受新的思想,在罪恶的宗教势力面前表现出一个普通妇女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能有的最强烈的叛逆精神。

公开受辱之后,她选择了独自承担生活的痛苦,决不乞求他人的同情。即使有人因为曾经接受过她的帮助,而准备向她表示一点怜悯的时候,她也毫不动心,而是把手指放在胸前的“红字”上以示拒绝。她以一个离群索居者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习俗,以及教士和立法者所建立的一切。她批评牧师的授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刑架、家庭以及教会等等。她对于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敬畏之情,就跟印第安人对它们的感情差不多。她的命运和遭遇反使她日渐自由。

二

勇敢性和反抗性是海丝特·白兰的主要性格特征,体现了作者展开社会批判、追求平等自由的欲求,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但这并非是作者塑造海丝特·白兰形象的最终目的,因为任何人物都不能超越时代和历史,不能超越性格和生活的发展逻辑。海丝特·白兰性格中的勇敢性和反抗性虽然是作者的理想化要求,但必须与充满动荡的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想以及人物的特定生活环境和身分相一致。所以,作者在赞美其性格中勇敢而富有反抗精神的一面的同时,更看重的是勇敢性和反抗性背后的东西,即这一形象与时代社会、宗教文化的关联。妥协性就是这一关联的有效承载方式。这样,妥协性不仅成为海丝特·白兰性格的有机构成,而且是其性格的深化和发展。从海丝特·白兰的性格发展历程来看,勇敢性和反抗性始终伴随着妥协性,并且妥协性是深化形象内涵、凸现审美价值、展现艺术魅力的基础。

海丝特生活在17世纪宗教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北美殖民社会。强大的宗教势力撒下了天罗地网,令人窒息的宗教精神像鸦片一样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海丝特有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欲求,但无法完全摆脱宗教思想对她的束缚和禁锢,这就造成她思想和行为上的妥协性。她虽深知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但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宗教戒律,在上帝面前自己是罪恶的。她胸前佩戴的A字分明在告诉她,如果她有罪,那么她身边那些人无论身体的贵贱,所处地位的高低,都有罪恶,可她总是“努力使自己相信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有像自己那样罪孽深重”。与丁梅斯代尔的偶然相遇虽给她带来片刻慰藉,但同时又带来深刻的刺痛,因为她认为在“那简短的会见中,她重新犯了罪”。宗教思想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虽曾力图打破它对自己的禁锢,并在行动上迈开了一步,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这强大而无形的巨网。于是,她日复一日地受凌辱受折磨而毫无怨言,竭力使自己相信这样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当陌生人审视她胸上的红字或当珠儿恶作剧地向红字投掷苹果时,她虽感到铭心刻骨的刺痛,却忍住不用手去挡它,因为她相信“只有用这种难以说出来的痛苦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赎罪的苦行”。多么可悲可怜的女人!难道只有苦行而没有灵魂上的忏悔,上帝就会饶恕她吗?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向往婚姻幸福而又具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女人的苦苦挣扎,她时而发出战斗的呐喊,时而发出绝望的哭泣,在生活的海洋中做着无助的沉浮。

既然她无法摆脱罪恶感,坚信上帝的存在,她便惧怕上帝对她的惩罚,尤其惧怕这一惩罚落在她惟一的宝贝——珠儿身上。“她每天忧心忡忡在观察着孩子逐步成长的个性,唯恐发现某种阻碍或狂野的

癖性,即那些跟产生这个小生命的罪恶相一致的癖性。”她虽朦胧地认识到妇女解放的根源所在——即推翻整个的社会制度,却又错误地相信她的不幸遭遇是由她自己的癖性所造成。尽管她自己不完全相信宗教,甚至对宗教法规持否定态度,却希望女儿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似乎只要珠儿严格地按照清教徒的法规行事,就能避免像自己那样的命运。

有人或许认为,海丝特之所以能在7年的生活中忍辱负重,与世无争,虽然她有一些大胆的想法,却能够以十分平静的态度服从社会的外部规则,完全是因为珠儿。一方面,珠儿是她生活中的慰藉,她作为母亲的热情全部宣泄于教育孩子身上,便淡化了自己的追求。另一方面,出于对珠儿的爱,她不愿意自己的行为危及孩子,于是母爱大大地削弱了她的反抗精神。

如果以上设想成立,那么在心爱的人已死,而珠儿又远嫁欧洲有了自己的家时,海丝特应该是一个无所顾虑的反抗更加彻底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离开这块殖民地多年以后,“海丝特·白兰又回来了,又戴起她抛弃已久的耻辱”!因为,“这里有她的罪孽,有过她的悲伤,这里还有她的忏悔”。在过去的岁月中,迫于社会的压力,她虽不得不把对社会的不满深埋心中,作出表面的让步和妥协,她却从未停止过抗争,她虽时常“没有头绪地徘徊在黑暗的思想迷宫里”而不知所措,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反抗。而如今本该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残酷的宗教法规进行彻底斗争时,她却心甘情愿地重新戴上标志耻辱的红字,去做不能得到原谅的忏悔。她相信“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将建立在一个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却劝告像她一样受苦受难的姐妹们要忍耐,要等待,仿佛“光明的时期”会自行到来。

从海丝特当年面对全镇的鄙夷仍能昂首挺胸,到遭受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希望全部落空后,转而自觉地悔罪,再到她给自己安排的墓葬形式和墓志铭所表达的她的认同,对人生的凄凉、悲惨和黑暗的安分而无奈的接受来看,海丝特·白兰的性格经由妥协性的积蕴与升华,不仅突破了勇敢性、反抗性等表面化单一性倾向,承载起变革时代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显得更加丰满厚重,具有令人品咂不尽的审美余韵,而且在对社会、宗教、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方面也显示了更加犀利的深刻性。海丝特·白兰性格中的妥协性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

三

海丝特·白兰性格中出现上述妥协性,与霍桑本人的思想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依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将文学活动视为“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理论而论,海丝特的性格作为作家审美意识物化的产物,自然与霍桑脱不了干系。

霍桑出身于新英格兰破落贵族世家。其祖先中有两代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权力机关中的要人,曾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霍桑幼年生活过的萨莱姆镇,曾是美国历史上发生著名“驱巫”案的地方。受加尔文教的影响颇深,饱受此一地域宗教文化思想的浸润,霍桑成年后在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景时,总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敢于抨击加尔文教毒害人的宗教狂热和窒息人的宗教教条,在想象中追求一种抽象的美,一种超凡入圣的完美精神境界。一方面又以具有浓厚宗教气息的善恶观念来看世界,把他不能理解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全部归结为一个“恶”字。认为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的根源都不在社会物质生活当中,而是由于世界上固有的一种“恶”造成的,从而强化了加尔文教教义中关于“原罪”、“内在的堕落”等观念。正因如此,在《红字》中,他一方面基于批判宗教偏执摧残人的立场,着力表现了海丝特·白兰勇敢而具有反抗性的美好品格,对其不幸命运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他又从加尔文教的原罪观念出发,肯定了早期清教徒的认真严肃,消解了海丝特的勇敢性和反抗意识,让其在妥协性中寻找人生的最终归宿,在“原罪”里获得心灵上的自我拯救。

霍桑在海丝特·白兰的性格中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妥协性一面,这是他的宗教沉思的结果。海丝特·白兰的妥协是从“罪”开始的,伴随着“罪恶在哪里?”“谁是真正的罪人?”的追问,她一步步被逼上妥

协赎罪之途。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因此,度过了7年耻辱的生活。胸前佩戴的红色的“A”字即是罪恶的象征。7年之后,她终于使胸前屈辱的红字变成了德行的标志。这一过程正契合了霍桑“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的理念。

不仅如此,在《红字》背景的选择上,为了主题和人物塑造的需要,霍桑独具匠心地将其定格在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那时的新英格兰正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得令人窒息的时代。迁移到这里的清教徒们不只是把旧英格兰的宗教教条应用到这里,并且对其加以发展,致使它的苛刻严酷程度比起旧英格兰的宗教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狂热的清教徒为了捍卫他们宗教的纯洁和正统,对于来自罗德岛的贵格会教派的清教异端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驱逐及至处死。对于该殖民地内部那些所谓的异端分子或触犯宗教戒律的教徒也进行了严厉的迫害。这就是历史上始于中世纪并持续于北美清教时代的驱巫运动。霍桑作为他们的后代,对他们的行为“深感羞愧”,并祈求“由他们召来的诅咒”从此以后被消除干净。由此不难看出作者表现海丝特·白兰妥协性格的宗教训诫目的。

[参 考 文 献]

- [1] 茅玉玲. 论海丝特·白兰[J]. 外国文学研究, 1981, (4).
 [2] [美] 亨利·托马斯·霍桑. 外国作家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3]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n the Character of Hester PRYNNE in The Scarlet Letter

LI Ru-shou

(Xiangfan University, Xiangfan 441000,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Ru-shou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Xiangf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by American romantic writer Nathaniel Hawthorne, many critics show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heroine Hester PRYNNE. In fact, she is a brave woman with strong rebellion spirit, but she is not a firm rebel because of her compromise. However, it is her compromise within her bravery and rebellion that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both romanticism and puritan ideas on the author and that is the true reflection of the conflict of his ideal and reality.

Key words: bravery; rebellion; compromise